2026年11月3日 星期二
本版责编 陈 璐
电话:010-64294501 E-mail:pinjian2023@163.com
中国文化报



白山清响 松水长吟

张 宁 马大勇

AI制作

吉林,白山南峙,松水东环,为清代发祥重地。地名源自满语“吉林乌拉”(吉林谓“沿”,乌拉谓“江”,“吉林乌拉”即“沿江的城市”),江水(满语称“松阿里乌拉”)导源长白山,取义天河,即松花江。《山海经·大荒北经》有载:“大荒之中,有山名曰不咸。”后世考证,不咸山即钟灵毓秀、巍然耸立的长白山。

其地史迹悠邈,自古是少数民族繁衍生息之所。上古隶属肃慎(稷慎),《国语》记载,肃慎献楛矢石砮,助周武王克商。惟此地处荒隅边徼,气候寒凛,多军府而少民官,文教开化晚于中原。及至唐代,白居易逸事传为佳话,后人借此歌咏:“三百年来开朴陋,鸡林韵事此先河。”黑水骚人富有白山诗卷,可由此溯源。

辽金以降,黄龙府雄峙(今农安),是辽代控扼女真的军事要隘,岳飞“直抵黄龙府”即典出于此。《金史》谓:“生女直地有混同江、长白山,混同江亦号黑龙江,所谓‘白山黑水’是也。”

迄有清一代,境内江流始定名松花江。江水东北而下,与黑龙江汇流,此段沿袭“混同江”旧称;混同江继续东流,乌苏里江自南侧汇入。清廷沿用明永乐船厂故址,调集满洲官兵营建水师战舰。在清代大一统地理观念的附会下,泰山地脉竟被推源至长白,足见朝野对龙兴故土的尊崇。彼时,源自元明东海女真的赫哲、费雅喀、鄂伦春、奇勒尔四部活跃,“冰天鱼作服,陆地狗行船”(杨宾《宁古塔杂诗》)为东北边陲涂抹了别样的民俗色彩。清初实施封禁,修筑的柳条界蔚为边疆史上一道奇特景观,即“西接长城东属海,柳条结边画内外”(弘历《柳条边》)。

康熙三莅兹土,望祀长白,松花放船,徜徉辉发、叶赫、哈达诸故墟,留“榻边鼾睡声先定,始布中原一著棋”(玄烨《行围所经辉发、叶赫、哈达诸地》)之吟。乾隆四巡吉林,缅怀努尔哈赤以十三甲胄发迹于此,颂“开创艰难自大东”。又旁稽刳木为舟、童习弧矢、冰行爬犁、掷噶什哈等旧俗,追怀先民遗风。在满洲政权入主中原多年后,汉风浸融日深,这片土地成为葆存其文化根脉的所在。康熙十五年(1676年),统辖松花江流域及以东广袤地域的宁古塔将军移治乌喇(今吉林市)。

乾隆二十二年(1757年)改称吉林将军,总揽东北边防与八旗军政,身负守护龙兴故土、抚绥边民之责。福康安、词臣尹继善之子庆桂、瑚松额等重臣先后任职,嘉庆皇帝以“天造邦家肇,吉林实故乡”申守土之训。

时人有“天下才子流人多”之说。清代文治武功之世,亦是大批江南名士蒙冤罹祸之时。他们被流放至“冰雪嵯峨关塞黑”(吴兆宽《感汉槎〈秋笳集〉》)的宁古塔、尚阳堡一带,虽身陷困厄流离,却在粗粝酷寒的苦难土壤中顽强孕育出敷扬文教、开发蒙昧的文明繁花,实为东北崇文学风之滥觞。

流人中,“江左三凤凰”之一吴兆骞声名最著。谪居宁古塔二十余载,吴兆骞曾被调往乌喇,撰成千言鸿篇《长白山赋》,极尽铺陈,摹写群峦、松林、天池、飞瀑、冰雪奇观,景象雄奇瑰丽,进御后令皇帝动容。他笔下的行役见闻,可称清初吉林面貌的珍贵文献:途径黑松古林,见“连峰如黛逐人来,一到频惊暝色催”(《小乌稽》)、“栖冰貂鼠惊频落,蛰树熊罴稳独悬”(《大乌稽》);寒威早厉,则有“回风绝壁森昼阴,六月空蒙见残雪”(《早秋陪诸公游密将山》)、“松花江水寒如练,七月吹寒满郊甸”(《送人还蒙古》)……种种险异荒莽的原始景观,皆是中原诗坛少见的边塞写照。文士流人尚得边民优待,谪戍军卒的命运更为凄苦,正是“刁斗声中起控弦,混同江水动楼船。十年谪戍头今白,犹着征衣更出边”(《送人从军》)。

身处荆天棘地、音书断绝的遐塞,流人相与砥砺,患难相知。吴兆骞《忆旧书情寄子长一百韵》咏叹:“道屈才还大,情深骨已镌。”对于“塞外文章之友”,兆骞多有称许:陈子长谪徙辽东,风流文采不减“京华三绝”之一顾贞观;方拱乾、孝标父子南还后,塞垣为之寂寞;钱维德议论雄肆,诗格苍老;山阴杨友声诗格清丽;张缙彦有江左风味;门人陈光启秀而嗜学。另有“苕中三钱”、金陵姚其章、阳羡陈卫玉等一众才士。这批谪戍文人,共同构筑起以宁古塔为核心,辐射黑、吉、辽三地的边疆文脉。

白山黑水亦能孕育出诗笔卓荦的一方才俊。康熙年间,出身乌喇部长后裔的八旗诗人马长海,与李锴、梦麟并称“辽东三家”。及至清中叶,沈承瑞师承蒋士铨,以诗见重,而隐于家乡、热爱家乡,所作《新年竹枝词》饶有乡土生趣:“雪白灯红敞绮筵,相逢一例话新年。酣呼未罢今宵酒,又有人邀第二天。”这份浓郁的桑梓情怀,数十年后滋养了“吉林三杰”。宋小濂《松花江行》以“南通长白北兴安,西带辽源东海涘”抒写故土边防之思;徐鼒霖从戎救国,惟欲报效边庭;“抗衡中原,未遑多让”的成多禄诗艺冠绝,凭吊乌喇古台,留下“鸭江西浸天倒吞,凤山北下云直走”的雄奇诗句。

吉林群山绵密、物产丰饶,渔猎传统源远流长。山野江河产出专供内廷的东珠,又有松花玉、人参、榛蘑、貂、獭、雕、鹿、鲟鳇鱼等诸多特产,乡谚“东北三样宝,人参、鹿茸、乌拉草”更世代相传。与名贵山珍相比,看似平凡素朴的乌拉草,却如诗句“何如束草随身具,春在先生杖履中”(吴大澂《乌拉草》)所言,饱含护佑边地民生的人间暖意。而“羽族之鹜者”惟海东青,朝鲜使臣洪良浩曾以“金眸玉爪横秋空,千里雉兔无全形”(《海东青》)描摹其凌空击猎的雄姿。

吉林壤接朝、俄,只隔图们一水,山川险却少关隘。清末俄人占领珲春黑顶子,爱国名臣吴大澂奉命勘界谈判,夺回图们江中国船出海权,重厘东界,并立碑石、铸铜柱,自篆铭“疆域有表国有维,此柱可立不可移”。其诗亦明守土之志:“西邻疆域侵陵计,东土屏藩久远谟。占地无多互樛葛,立牌有记莫枝梧。”(《丙辰奉使珲春纪事》)以词臣之身,建安边之功,吴大澂在吉林大地镌刻下寸土必守的爱国风骨。

风云迭代,崛起于荒榛的渔猎民族于北国长卷镌下朴拙痕印,但历史轮辔浩荡,不曾为文教晚启的边地暂缓脚步。晚清沈兆禔寓居吉林,撰成兼具史料价值的韵文方志《吉林纪事诗》,诸如“跳神降福女巫遣,满语喃喃应鼓鼙”“满汉婚丧礼各崇,偶居渐渐染华风”,不愧为吉林“豳风”。

清末民国,雪蕉诗社、松江修暇社继起,北国诗坛风雅不绝。参与者既有本土才俊成多禄,也有随时任省长郭宗熙赴吉的瞿方梅、雷飞鹏、成本璞、栾骏声等南方幕宾。军阀扰攘之世,北山、龙潭山的山水胜景,成为一众文人栖心寄怀的精神桃源。他们登临宴集,诗简酬答,或以“四邻谋国歌山枢”(雷飞鹏《登南天门歌》)寄家国之忧,或以“山啸边风甲杖开”(阚毓泽《再和澹堪北山书感韵》)摹写塞垣雄胜,为白山黑水留存一抹乱世里的清雅诗心。长沙黄兆枚亦万里赴吉,采风问俗,撰60首《鸡林杂咏》,《疆域》一篇以“柳条边里是鸡林,绝塞河山自古今”咏叹边土。

岁月流转,后人踏足此地,感触到的不仅是白山黑水的质朴辽阔,更有豳风余韵的历史回响。女真发祥、流人文脉、龙虎石刻、松江集会……诉说着“才人塞上补新词”的往事,它们赋予吉林土地深沉的精神底色,供后人稽古思往,汲取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。

中国诗词地理品读之吉林篇

大典撷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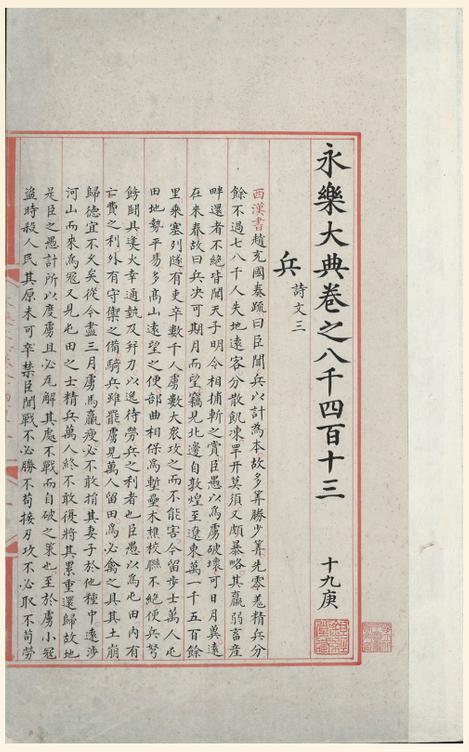
搜罗颇见费心艰

——袁同礼与北平图书馆对《永乐大典》的搜访

赵爱学

清宣统元年(1909年),国家图书馆前身京师图书馆创建,学部提议拨付翰林院剩余的64册《永乐大典》。民国元年(1912年),经鲁迅积极推动,教育部正式划拨其中60册。自此,搜聚、保护散佚的《永乐大典》,成为京师图书馆、北平图书馆、北京图书馆、国家图书馆一脉相承的使命。袁同礼主持北平图书馆工作期间,馆藏《永乐大典》实现大幅增长,让北平图书馆成为彼时全球《永乐大典》收藏与研究中心,袁同礼也成为调查搜集《永乐大典》、促进珍贵古籍海外回归的代表人物。

20世纪20年代初,留美期间的袁同礼便萌生了搜集《永乐大典》的想法。他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实习时,曾目睹欧美各国全力搜罗全球珍稀古籍,尤其是1923年美国国会图书馆一次性购入29册嘉靖本《永乐大典》,深深触动了富有爱国情怀的他。同年,他赴欧洲实地调研《永乐大典》流散情况,年末撰成《永乐大典考》,初步著录存世《永乐大典》149册。执掌北平北海图书馆、国立北平图书馆后,袁同礼将《永乐大典》的调查、搜聚列为重点工作,开启了近20年的费心搜罗之路。



明嘉靖写本《永乐大典》卷8413
国家图书馆藏

持续更新馆藏目录、公开发布征集倡议,是袁同礼的核心举措。1923年至1939年,他12次发布、修订《永乐大典》现存卷目表,持续呼吁海内外公私藏家公示未著录的藏本。常态化的信息更新与征集倡议,在图书馆界和古籍收藏界引发广泛反响,让大量秘藏民间、流落海外的《永乐大典》残卷得以现世。1929年新北平图书馆组建后,袁同礼依托自身深厚的欧美学界人脉与职务便利,面向全球征集《大典》信息与副本,致函嘉业堂刘承幹、上海东方图书馆,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、康奈尔大学,英国大英博物馆、牛津大学、剑桥大学、藏家默顿,越南河内远东学院等海内外机构与个人,申请摄制或影抄副本,获得积极响应。

袁同礼借助中华图书馆协会平台开展搜聚工作。1925年协会成立后,袁同礼长期主持执行部工作,依托协会下设的善本调查委员会,专项调研《永乐大典》等珍稀古籍。1927年,他以协会名义赴日本调查《永乐大典》等汉文古籍;1929年在协会首届年会上提交议案,呼吁国家层面交涉追回庚子年间流失的《永乐大典》等古籍,通过影印等方式收回保存。

袁同礼充分调动馆员以及学界友人等中外社会力量,多方推进搜聚工作。馆方选派王重民、向达等优秀馆员赴欧美交流,一边深造学习,一边实地调查当地馆藏《永乐大典》。王重民不仅在英国购回1册《永乐大典》,还依托海外学者人脉持续寻访典籍,同步向国内传递海外馆藏动态,复制副本。馆内赵万里、顾子刚等同仁各司其职,赵万里整理搜访到的《永乐大典》,并编制索引、开展辑佚研究,顾子刚专职对接海外联络事务,后来捐赠了3册《永乐大典》原本与2册抄本。中外友人也纷纷助力,中国驻法公使高鲁购回4册,湖北黎澍代购2册,美国加斯基尔小姐与北平长老会的希克司夫人促成1册捐赠。

文献交换是袁同礼和北平图书馆获取《永乐大典》,尤其是复制本的重要方式。1931年,北平图书馆与德国汉堡大学达成图书交换协议,成功换得2册《永乐大典》嘉靖原本,受太平洋战争影响,这批典籍直至1950年、1951年才由在美国的袁同礼接收。鉴于原本交换可遇不可求,袁同礼将搜集复制本作为核心目标,依托自身馆藏优势,以高仿抄本与海内外藏家交换复制本,既节约成本,也契合海外藏家的收藏需求。如今英美多家高校及图书馆留存的北平图书馆旧藏抄本,皆是这段典籍交流的珍贵见证。

一桩桩购买、捐赠、交换、复制事宜的背后,凝聚着袁同礼和馆方的无数心血。对于已掌握线索的藏本,馆方持续对接、及时复制,众多散佚典籍在流转、出境前得以成功留存副本。如卷14949、卷20373二册于1930年11月为加拿大葛思德文库买走,12月平馆趁书还在北平时借来抄录一部;卷7237—7238、卷10539—10540等4册在流到日本前也及时存了副本。

多年的搜罗终获丰硕成果。到袁同礼1939年7月最后一次发布卷目表,著录存世《大典》数量达367册689卷,较1923年初次统计实现翻倍增长,而目前全球存世总量仅416册。至1948年,北平图书馆馆藏《永乐大典》原本从最初的60册增至106册,同时增加了至少117册抄本和摄影本。新增原本多来自民间私人收购,相较于通过书商间接购买,征集难度更高,也更反映了袁同礼与平馆的费心工作。1930年至1933年是复制的高峰期,累计完成复制109册,底本来源覆盖中、美、英、越、德、加等多国。依托袁同礼的海外人脉,欧美地区复制成果尤为突出。复制形式也随时代变化,1931年前以人工影抄为主,之后主要采用海外摄影复制模式。

1929年新馆成立后袁同礼的大力推进,让北平图书馆的《永乐大典》收藏工作达到鼎盛,也成为北平图书馆业务黄金发展期的标志之一。遗憾的是,这一美好局面被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无情打断。值得欣慰的是,袁同礼与北平图书馆同仁的多方努力没有白费,他们的工作不仅让北平图书馆成为当时的《永乐大典》资料中心,也为学界利用、辑佚以及1960年中华书局大规模影印《永乐大典》,乃至今天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高仿影印《大典》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图书馆)

文物映中华

器物中的柿文化

周小丽



战国错金银铜鼎

陆游《秋思》有言:“园林夕照明丹柿,篱落初寒蔓碧花。”霜降是秋收的终点,也是寒冬的序曲。随着霜风渐起、木叶转丹,一串串火红的柿子,满溢着丰收的喜气,治愈了秋天的萧瑟之感。

我国柿树种植历史久远,《礼记》已将柿子列入果品,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《上林赋》中曾记载“枇杷橪柿”;南北朝时,柿子开始由庭园栽培发展为大面积种植;及至唐代,“教民种柿”蔚然成风;相传朱元璋落魄之时得红柿果腹,封柿树为“凌霜侯”,更为柿子增添一层传奇色彩。俗谓柿树有“七绝”:一寿,二多阴,三无鸟巢,四无虫,五霜叶可玩,六嘉实,七落叶肥大,可以临书。柿果形态丰厚圆硕,“柿”又与“事”“世”谐音,故有“事事如意”“万世顺心”之寓意。历代文人吟咏柿子,画家绘制柿图,医者配制柿药,匠人则撷取柿之圆融清意,将柿蒂纹样、柿果形态熔铸雕琢于器物之上,共同构成丰富多彩的柿文化。

《酉阳杂俎》记载:“木中根固,柿为最,俗谓之柿盘。”柿蒂纹通常呈现出对称的四瓣,每瓣朝向不同方向,象征着四方的和谐与稳定,是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纹样之一。洛阳博物馆珍藏的战国错金银铜鼎,是1979年出土于洛阳小屯窖藏的一件王室重器。其重1205克,成人手掌大小,器盖与器身扣合严密,整体呈扁圆球形,像一枚精致的微缩青铜星球。鼎盖向上拱起,盖心铸铺首衔环纽,纽的两侧,一对鎏金蟾蜍两两相对,神态鲜活。鼎身鼓腹饱满,下方承托三枚兽蹄形足;口沿两侧立方形附耳,两耳之间伸出一根中空上翘的短管,也就是这件鼎独有的“流”。鼎在商周是象征王权社稷的核心礼器,春秋战国时期,青铜鼎的功用逐渐分化,贵族宴会直接用鼎品食羹汤,这根短流正是实用化的直接体现。铜鼎造型精巧、装饰华丽,周身遍布错金银纹饰:盖沿、鼎身装饰三角云纹带,盖面与腹部绽放错金银四瓣团花,即柿蒂纹形态,蹄足缠绕灵动云纹。沉郁古雅的青铜底色,更衬得金银纹样光彩熠熠。

唐代诗人白居易《杭州春望》中的“红袖织绫夸柿蒂,青旗沽酒趁梨花”,写出了唐人偏爱柿蒂纹样织锦的风尚。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唐三彩梳妆女坐俑,正是这份纹样之美的记录与体现。仕女梳着单刀半翻髻,面部圆润,红唇粉面,眉如柳叶,神态楚楚动人;身穿袒胸褐色窄袖衫,外套黄白地绿色花纹短襦,下着嫩绿色百褶长裙,裙子上绣着唐代流行的橙黄柿蒂纹。长裙高束至胸前,长长的褐色裙带在胸前扎一花结,裙带结自然下垂,裙裾宽舒,长垂曳地。这样齐备的衣着,显然已是外出梳妆打扮的最后一步了,古代女性的爱美之心也由此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宋人追求清雅,偏爱小巧仿生用具,柿子造型的文房成为案头宠儿。南宋龙泉窑粉青釉柿形水注现藏于杭州博物馆。这件瓷水注中空,扁圆,圆鼓腹,小巧别致,展现出文人精致清雅的审美趣味。水注顶部中心位置微微下凹,围绕中心的五片柿叶花纹若隐若现,不同于传统“一尖两弯”的柿蒂纹。其中一个叶片间隙贴上S形细泥条,形成半圆形困藤钮。肩部一侧有一出水短流,另一侧有一圆形注水小孔。使用时,先在器体内贮水,移至砚台倒水时,可先用手指堵住注水孔,利用负压吸住器内之水,然后慢慢移开手指,根据墨汁的浓淡需求注入不同水量进行研墨。水注通体施青釉,釉面光润细腻,足底支烧处呈现火石红特征,不仅是南宋文房精品,更见证了龙泉窑在青瓷史上的美学高峰。南京博物院收藏的元代柿形银水盂,也是一件文房雅器。其银质器身饱满圆实,器盖塑成卷曲柿蒂,不事繁饰,简约凝练。可见,元代文人依旧延续宋韵,将秋柿之形藏于书斋,寄愿诸事圆满。

在追求图必有意、意必吉祥的明清,柿形器物愈发繁盛。北京市海淀博物馆收藏的清代青玉雕柿柿如意摆件,为乾隆时期佳作。青玉圆雕并蒂双柿,柿叶舒展,枝蔓下连一柄灵芝如意,寓意“事事如意”。玉匠巧用玉料天然色泽,以深浅层次衬出柿果饱满肌理,静置于案,秋意与吉庆并存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中期柿形文竹金漆盒,则是竹雕工艺的巧思之作。整器雕刻成柿子形状,通体镶嵌竹黄,表面刻有精细的锦纹装饰。柿盒可从中部一分为二,盖子和盒身通过子母口扣合,内壁涂有金漆。盖钮部分雕刻成柿蒂状,色泽和质地与竹黄相得益彰。清朝中期,宫廷内流行文竹仿生器具,这些器具虽然保留了实用性,但更多时候被用作陈设装饰。

清代紫砂名家陈鸣远更将柿器的仿生艺术推向高峰,亮相于2019年西泠印社十五周年秋拍的紫泥松鼠柿子壶,就是他的作品。扁圆壶身压出四条对称凹线,塑成四瓣柿果形状,线条圆润柔和。壶嘴卷成柿叶状,壶盖翻卷柿蒂,蒂上伏一只灵动松鼠,取“好柿发生、硕果丰收”之意。壶流下侧刻“子式先生,鸣远”,下钤“陈鸣远”篆字阳文方印。铭文据考为与陈鸣远合作密切的曹廉让青年时期手笔。“子式先生”即卓子式,塘栖人,号东园主人,此壶是陈鸣远为其专门制作。紫泥朴质温润,刻款雅致,一壶在手,兼具茶用与赏玩之趣。

(图片由作者提供)



唐三彩梳妆女坐俑



南宋龙泉窑粉青釉柿形水注



元代柿形银水盂



清代青玉雕柿柿如意摆件



清代紫泥松鼠柿子壶



清代中期柿形文竹金漆盒